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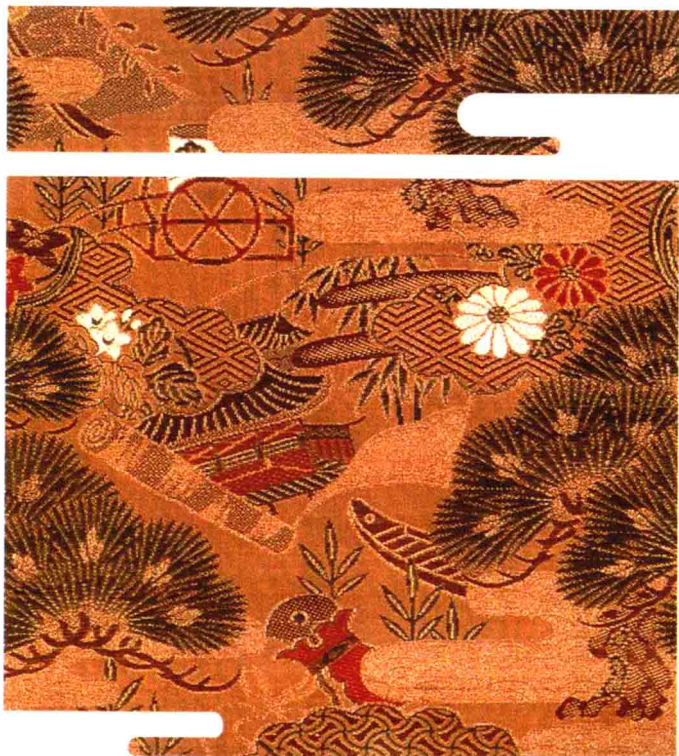
日本中國學文萃

王晓平◎主编

陶渊明·陆放翁· 河上肇

[日] 一海知义◎著

彭佳红◎译



日本中国学文萃

王晓平◎主编

陶渊明·陆放翁·河上肇

〔日〕一海知义◎著

彭佳红◎译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陶渊明·陆放翁·河上肇/(日)一海知义著;彭佳红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8.2

(日本中国学文萃. 王晓平主编)

ISBN 978-7-101-05987-8

I. 陶… II. ①—…②彭… III. ①陶渊明(365~427) - 人物研究②陆游(1125~1210) - 人物研究③河上肇(1879~1946) - 人物研究 IV. K825.6 K833.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204607号

TO ENMEI

by Tomoyoshi Ikkai

©1977 by Tomoyoshi Ikkai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ese in 1997 by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This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vear of publication

by Zhonghua Book Co., Seoul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 书 名 陶渊明·陆放翁·河上肇
著 者 (日)一海知义
译 者 彭佳红
丛 书 名 日本中国学文萃
责任编辑 马 燕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年2月北京第1版
200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6% 插页2 字数200千字
印 数 1-2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5987-8
定 价 16.00元
-



总序

王晓平

日本人(包括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迁徙到列岛的人们及其后裔),至少从我国南北朝时代便揭开了研读中国典籍的历史,而伴随中国文化进入日本所产生的一系列文化现象,诸如写经抄书、创造假名、官中讲经、发明训读、朗咏流行、设明经文章诸科博士、藏典修史等等,构成了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壮观的奇景。日本人审视中国的同时,也在成就着自身。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从广义上讲,日本人研究中国,几乎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岁月,但学界真正把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为“中国学”,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

长达一千五百年以上的中国研究史,是与日本文化的开创和发展紧密联系的。尤其在近代以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完全抛开中国学术史,便没有完整的日本学术史可言。但是,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研究中国的目的、方法和态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尽管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文献学的影响依然存在,但与西方学术同时也与本土固有文化研究建立的联系,远比与中国同时学术的联系敏感、紧密而又牢固。不论如何,从古至今,日本学界产生了众多研究中国的大学问家和名文名著。

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与中国自身的学术研究最大的不同,就是主导这门学问的根本课题,是岛国日本如何面对大陆中国。它



们不仅植根于异质的文化土壤,从属于日本文化体系,反映或者作用于当时日本的包括民族主义思潮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在日本学界获取评价,而且根本目标在于发展日本文化。所以尽管它们有时与中国本土学问面临着同一对象,然而两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和价值。

在世界文化走出各自分割历史阶段的今天,国外中国学与中国的国学共同构成世界的学术中国观,而又各属不同的学术体系,发挥着不同的文化功能。对于我们的国学来说,国外的中国学可以说的不宜回避的“他者”,日本的中国学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进一步说,日本中国学除了具有其他国家中国学的共性之外,还有一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离不开一个“近”字。例如,由于许多业已散佚的中国文献通过抄本或者刻本保存在日本,使得日本成为域外最重要的中国文献资料库之一;又比如日本拥有传统的阅读和训释中国文学的特殊手段等等,这给中国文献的传播和解读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同时,由于中日两国学术交流源远流长,日本中国学与日本学研究的关系特别紧密,也使得它在考据和比较研究这两方面,有着更多的资源和课题。

在日本,对日本古代学术文化的研究,常常不能与对中国的研究一刀两断,再加上现代学术谋求沟通的大趋势,便使得日本中国学者,例如内藤湖南、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人的著述的影响超出了中国学的范围;另一方面,某些研究日本学的著述,例如明治时代的民俗学家、最早的环境保护运动力行者南方熊楠,有“知识巨人”、“时代代言人”之称的加藤周一,“文化功劳者”称号获得者



中西进等人著述中涉及到中国学的部分,也都有一读的价值。

日本近代以来在某些研究条件或手段上不同于中国本土,日本学人多重实闻亲见,不尚空谈,长于细读深究。他们在某些领域,例如中国宗教文化、敦煌文学、中外关系史、艺术史以及中国戏曲小说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曾给中国学人以启迪。日本从奈良、平安时代起逐渐形成一些接受中国文学的热点,如《文选》、《白氏文集》、《唐诗选》、《古文真宝》等,对这些作品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成果,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有着互补互鉴的作用。这些都使得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报以热眼。学人多以“他山之石”、“邻壁之光”来强调这种关注的借鉴意义。

与此同时,中国学术界又从很早便有了对盲目追随日本学人态度的批评。早年章太炎先生对这种态度给予的辛辣讽刺,虽不免言之有偏,却仍不失警戒之功。前辈学者对于当年那些所谓“支那通”的揭露,更不该忘记。在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展开系统研究的时候,仍有必要反对任何形式的食而不化与人云亦云现象,强调中国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统一,葆有学术自信和识别眼力。

今天,更要看透那些变样翻炒“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的所谓“中国通”,他们往往将历史和现实作短线连接,凭借现代媒体和出版业,朝论夕改,张大偏见,仅就学术手法而言,也实不足为训。应该说,这些人虽然不是日本中国学界的主流,但是他们头上也顶着“大牌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和“社会名流”的帽子,近年来忙不迭煽乎所谓“厌中”(讨厌中国)情感,就很有些拉着舆论走的能量。



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我们对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价值,绝不止于“借鉴”,也不应该停留在“此优彼劣”的结论上。对日本来说,日本中国学是日本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从整体上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某一时期日本人的中国观、中国形象、中日关系。日本的知识界,往往通过它们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专家们,以及有些并非专门研究中国的思想者写的关于中国的著述,对短期或者较长期的社会思潮,有时甚至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都起过某种作用。言说中国的学术话语与官方话语、媒体话语及民间话语等共同营造着中国形象,而其中学术话语的影响则更为长久深远。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学人来说,通过这些著作来了解日本文化、认识日本人、解读日本人的中国观,或许也不失为一条途径。同时,我们对日本社会文化看得越透彻,就可能对日本中国学研究得更为深入。

总之,在中日文化双方不能不互相正视的今天,对待格外重视师承流派、积淀深厚、做派繁复、多变多样的日本中国学来说,草草一瞥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原始察终,辨源析流,叩同问异,进而学会平等地与其展开卓有成效的学术对话。既是对话,那当然不是只“知己”就行了,还必须“知彼”,而且不是一般的“知”,而是要深知熟稔。所幸我们已经有了《日本中国学史》、《日本汉学史》等专门的著述,让我们看到了日本中国学乃至国际中国学研究的广阔前景。

国际文化交流发展到今天,在人们对吸收外来文化倾注着空前热情的时代,面对别种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显出更大的必要



性。这种声音,不是自说自话,而要有往有复。因而,加强对国际中国学的研究,必然会与我们的“中国学”走向世界相联系。在这一方面,日本学界可谓先行一步。为了推进国外的日本学研究,十多年以前,日本便建立了对外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最近又在法政大学中设立了国外日本学研究基地,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对国际日本学研究展开分析。以此反观我国知识界的一般认识,有些人多只看到那些操着怪腔怪调汉语的外国人在该国学界没成什么大气候,又爱发些对中国隔靴搔痒的议论,就轻看国际中国学研究的意义。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工作的紧迫性。

读书或可睹人。推进学术交流,化解误解误读,减少文化摩擦,出书、读书、品书与人员交流对话,是有力的两翼。我们阅读日本中国学著述的时候,如果不只停留在听他们述说什么,而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会那样说,和同时期中国本土研究有哪些不同,那么,这些材料就可能演化为我们拓展本土文化研究和外国文化研究两大领域更有用的思想资源。对于收藏在日本的中国文献,日本学者已经对文本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我国学者却常因为无法与原件谋面而深感遗憾。有些日本学者抱怨中国学者对日本存藏的中国文献抄本、刻本评价过低,而实际原因是这些资料一般中国学者很难看到。面对涉及各类学科的日本中国学著述,切实了解它们的最好方法无疑是阅读原著,而且是系统阅读,因为翻译有时难免会模糊两种文化的细微差异。然而,在很多有兴趣的学人还没有条件做到这一点的时候,翻译就显示着特殊的必要性。

我们选择一些篇幅不长、适于阅读的名篇名著、新人新作介绍给读者,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日本中国学的多种面孔。我们



在坚持学术规范的同时,也不应排斥学术研究的个性化与多样化,这些研究和写作方法的异色,或许能帮助我们扩大眼界。

我们这套丛书,没有选择像斯波六郎所著《文选李善注所引古文尚书考证》,或者太田次郎所著《以旧抄本为中心的白氏文集本文的研究》那样大部头的专著,它们学术价值很高而读者面很窄。这些书很重要,等条件具备,也应该译介过来。我们先要做的,是希望读者能认识一批比较好接近的客人,也就是一批学者为非中国学专业知识分子写的书。

日本一些研究中国学的名家,很重视为一般读者写书。吉川幸次郎曾提出让学问回归大众的口号,白川静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也强调在孤诣独往苦苦求索的同时,要努力使学问返回到“一般”,即回报于社会。像青木正儿等人文笔之好,在学界早有定评,他们关于中国文化的学术随笔脍炙人口,几十年来一直是书店的畅销书。

我们选择的书目,除了几部新人新著外,都是“大家”写的“小书”。或侧重其保留中国文献资料的价值,或侧重对中国本土研究的补阙,或侧重于对中日关系研究的历史作用,或侧重于其在日本学界的影响。取其一点,不必求全,积少成多,不拘一格,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通过这套丛书,读者便可陆续与那些久闻其名而未见其文的好友见面,共享日本中国学之景观。

序

一

本书著者一海知义是日本著名的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这次,他的著作在中国以选编的形式问世。其学术业绩以单行本的形式在中国出版还属首次,实可谓姗姗来迟。

对于那次“文化大革命”,一海知义始终持以坚定的批判态度。有些研究中国的日本人,曾打着“礼赞文革”的旗号迎合当时的中国。一海先生对他们投以严厉的白眼。这时期竟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

这次,中华书局决定翻译出版他的学术论著。为此,一海本人在自己的著作中选出了长短不一、形式不同的六篇近作。这些文章论及不同时代、不同国籍的三个诗人——晋代的陶渊明、南宋的陆游、二十世纪日本的河上肇的作品。其六篇论著的题目如下:

(1)《陶渊明——情寓虚构的诗人》(岩波书店,1997年)

(2)《陶渊明和孔子》(《文学》,岩波书店,1977年)

(3)《市河宽斋的〈陆放翁年谱〉》(《日本中国学会创立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汲古书院,1998年)

(4)《马克思经济学家河上肇和中国古诗》(《中国文艺研究会会报》第250期纪念号,2002年)



(5)《矛盾与实事——河上肇和陆放翁》(《文学》,岩波书店,1978年)

(6)《另一幅“自画像”——河上肇的陆游研究》(《思想》,岩波书店,1979年)

乍看题目,也许有人会对这三者之间的关联感到不解。其实这六篇精选作品能让读者相信:世上确实存在一种超越时空的、属于中国和日本的、产生于人与人心灵深处的共鸣。

这也就如选者本人所述:“当人深受感动时,这种感动将变成一种有机的力量,起到连接人和历史的作用,从而成为一种推动力。”

正因为陶渊明、陆游、河上肇三者均是睿智脱俗之士,所以对当时的权力横行一贯持批判、抵抗、不服从的态度。也正是这始终如一的人生哲学,使三者半世坎坷,饱尝了人世间的苦涩。三者虽然饱尝苦恼,但绝没有放弃做人的尊严,他们不卑不亢,超越时空得以实现心灵的交往,不愧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共同基点在于:相信未来,不欺骗自己,具有绝不迎合所处时代非法权势的叛逆精神。

基于上述原因,我认为一海知义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他时常在思考“该向对方传达什么?”他既是博学的读书人,又是一位文人、教育家。所以,他的文章每当问世必得好评也就不足为奇了。就说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解释吧,他能将一般被认为复杂难懂的中国古典文学(日语称之为“汉文”)的意思,用通俗易懂的日语准确地表达出来,让谁都能一看就懂。这让我们时常惊叹不已。而且他的表达方式是那么确切,找不出半点多余。这也正是让一



般研究者感觉力不从心的。

二

日本人自古以来从文明先进国的中国得到了不少恩惠。其中“汉字”和用汉字记载的“古籍”的传来,对于日本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来说,是一份最珍贵的礼物。我们的祖先从古籍中学到了很多宝贵的东西,所以历代的日本知识分子对古籍始终抱有一种崇敬之情。

比如,平安时代中期的藤原佐世编撰了日本最早的古籍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公元891年左右)就是一个珍重古籍的实例。当时日本国内收藏的多达16790卷古籍的书名、卷数、著者名等,就是赖此才得以留下如此详细记载的。

在古籍中,日本知识分子最热心阅读的作品是集中国古典之精华的《文选》。对日本的知识分子来说,《文选》既是修身的必读书,又是学习诗文的教科书,同时也是代代相传的珍贵文本。

虽说如此,对于大多数的日本人来说,《文选》无疑仍是一部“外国文学”作品。要理解其文字和内容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在日本,一般是选出容易解释的部分内容,将此作为一种共通的知识和文化修养来接受并且流传至今的。正因为《文选》集中国古代文学之精品,所以对于日本人来说并非是一部简单易懂的文集,所以在日本,有不少作品没能被准确地精读,错评误解也非罕事。

我们的先人始终偏爱简易部分,本书著者一海知义早在半世纪之前就曾在其著作的附录中,指出有关解释陶渊明的问题:

有的诗人虽然相当有名,但实际上他的作品并没有得到



广泛的阅读。即使是其作品中极小的一部分,如是能代表其诗人特性的结晶之作,那倒也罢了。可事实上并非如此,有的诗人以某一个被过分强调的侧面或因其传说而出名。我认为陶渊明就是其中的一个。(《中国诗人选集4》附录,岩波书店,1958年)

至少可以说在日本,陶渊明仅作为一个牧歌式的田园诗人而知名。可是,当要全面解释陶渊明的作品时,一个复杂而又难解的诗人形象不是就出现在眼前了吗?正因如此,一海知义才向天下宣称要把研究陶渊明的一生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

此后的三十九年个春秋,他默默地、再三地“深思熟虑”,不动声色地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这就是本书前半部分的《陶渊明——情寓虚构的诗人》。此书的出版,在日本初次精辟地解析了至今为止被搁放未解的、有关陶渊明的人生与文学的难题。我认为不仅是在日本,在世界上也是初次提示了全面性的“陶渊明论”。

我推测一海之所以把研究陶渊明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是想通过与渊明的“对话”来体验陶渊明所生活的时代,解析诗人陶渊明那独特的精神世界。“有关陶渊明身处的时代”、“陶渊明和当时的生活环境以及世俗关系”、“对于陶渊明那独特的个性,情愿奉陪到底”等,正是这些辛勤研究的积累,才创出了他人无法追随的、独特的“陶渊明论”。

不用说,在中国有不少研究陶渊明的专家。一海知义“情寓虚构的诗人”的论说在中国学者中将会引起怎样的反响?我诚恳地期待各种学术见解的涌现。

本书除此以外还选载了一海知义的另一学术课题即“南宋的诗人陆游”,以及晚年倾慕陆游诗的日本“二十世纪马克



思经济学家河上肇”的论作。河上肇在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横行的年代,是被当作最危险分子投入监牢的硬骨汉、正直的经济学家。他是为何,并且如何通过中国古典诗歌将陆游视为知己的?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解析,将使读者感受到超越时空、共鸣心弦的诗魂。河上肇注释的《陆放翁鉴赏》一书,如今仍是一海主办的“读游会”所选用的课本。

三

在此,让我简单地介绍一下一海知义的经历。

1929年5月15日,一海知义出生于奈良市的一个医生家庭。他的父亲名叫一海景道,一海知义是他的第六个儿子。1930年一海一家迁居京都。此后一海知义在京都长大成人。养育六男二女的父亲于1942年去世,时年六十八岁。一海在太平洋战争末期,因“学徒动员令”^①被征前往名古屋地区的军需工厂。他目睹很多同学在空袭时丧失了年轻的生命。不仅如此,一海的三个兄长虽然当时都还是学生,但还是被征兵赶上战场,一去不回。一海的大哥二十九岁时战死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二哥二十八岁时战死在缅甸,三哥二十六岁时在战地得病回国后病死在日本内地。这些令人悲痛的事实成了他心底坚定不移的反战思想的基础。众所周知,一海知义一贯积极参加“保卫和平与民主主义”的市民活动,这正反映了他强烈地意识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肩负的重任——绝对不能让剥夺三个兄长生命的非道义战争重演。

^① “学徒动员令”:太平洋战争时,日本政府对日本全国学生的强行动员。根据昭和十九(1944)年公布的“学生动员令”,中学生以上的学生全部参加军需工厂等处的劳动。



日本战败后的1953年，一海作为新制大学的学生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专业。在研究生院做硕士、博士生以及当研究助手的多年岁月中，他受到了著名学者吉川幸次郎教授的熏陶。1964年他在神户大学任教至1993年3月，一直讲授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学。一海执教鞭三十年间可谓桃李满天下。他在神户大学退休以后又在神户学院大学任教，直到七十岁时方成自由人。之后，仍在各地大学、文化教室等场所应市民邀请做关于中国文学的演讲，并以此为乐。同时，应后生之请主持精读陆游诗的“读游会”。目前，一海忙于著书和演讲活动，可谓不分昼夜，如此繁忙之中他仍不忘每天晚上的饮酒之乐。一海知义作为一位“可敬可畏的老先生”，受到众多人士的爱戴。

四

最后，简单介绍一下著者的学术业绩。一海知义的著作涉及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以及日中文学的相互关系等五个领域。一是有关司马迁和《史记》的著作，二是有关陶渊明的著作，三是有关南宋诗人陆游的著作，四是有关二十世纪日本的马克思经济学家河上肇和中国古典文学家陆游的著作，五是有关当今汉字存亡之论谈的“汉字学”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他的已刊著作中看到其论考范围之深广。一海如今虽已是七十八岁的高龄，可依然以旺盛的精力孜孜不倦地笔耕，实在令人敬佩。一海知义的首选著作十卷将于近期在日本问世。

后学 笈久 美子

2007年初春

目 录

总 序	王晓平(1)
序	笈久 美子(1)
陶渊明——情寓虚构的诗人	(1)
序 陶渊明与“虚构”	(1)
一 《桃花源记》——乌托邦的故事	(6)
二 《五柳先生传》——架空的自传	(20)
三 《形影神》——与分身的对话	(51)
四 《读山海经》《闲情赋》——神怪与女色	(59)
五 《挽歌诗》《自祭文》——“我”的葬礼	(65)
跋 为何“虚构”？	(90)
岩波书店初版后记	(96)
陶渊明和孔子	(99)
市河宽斋的《陆放翁年谱》	(124)
马克思经济学家河上肇和中国古诗	(138)
矛盾与实事——河上肇与陆放翁	(142)
另一幅“自画像”——河上肇的陆游研究	(166)
译后记	彭佳红(194)

陶渊明

——情寓虚构的诗人

序 陶渊明与“虚构”

众所周知，一千六百多年前，在中国有个叫陶渊明(365 ~ 427)的诗人。渊明^①被称为“酒诗人”，又被叫作超俗诗人。

“酒诗人”

所谓“酒诗人”，并不只是好酒诗人之意，而是由于陶渊明作了很多咏酒诗而得的称号。

渊明歿后百年，因編集《文选》而颇为有名的梁朝昭明太子萧统(501 ~ 531)编纂了有史以来第一部陶渊明诗集，并在序中评论其诗为：“篇篇有酒。”意思是说无论哪一篇里都有酒的描写。其实这话说得有点夸张，至今留传下来的一百二十余篇诗中，约有一半的作品是与酒有关的。然而从整体的比例来看，把陶渊明称为“酒诗人”也是名副其实。

有人说波斯的奥马尔·哈亚姆(1048 ~ 1131)和中国的陶渊明

^① 在日本的中国古典文学论作中，有把陶渊明称为“渊明”的习惯，以示作者对诗人的亲近感。为了保留作者的心迹，译文遵从了原文。下同。